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66期

2012年4月24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当前中美关系不处于紧张阶段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杰弗里 · 贝德

【编者按】2012年4月19-20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共同主办了“中美亚太安全对话”。本文为贝德在20日对话会上发表的特别演讲原稿，征得本人同意，在此译出，供参考。标题为编者所加。

自尼克松以来的八位美国总统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大同小异。他们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个人性情上都相差甚远，却能在对华政策方面得出相似的结论，这说明我们的对华政策通常是由总统认知的美国国家利益所驱动的。这一政策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中美关系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并努力扩大这种共同利益，而不是专注于双方在政治价值观上的区别（我在此使用“政

* 杰弗里 · 贝德 (Jeffrey Bader) 在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期间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在加入奥巴马政府之前，贝德曾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 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和负责对外政策的高级研究员。贝德长期参与美国对外政策和亚洲安全事务，曾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任职达30年。其最新著作《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美国亚洲战略亲历记》(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2012年3月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



治价值观”这一概念以代替经常被人提起的“价值观”，是因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例如强调家庭，重视教育、科学和技术，善待他人等等）；第二，在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朝鲜半岛和中东问题方面进行合作；第三，加强贸易、投资、交流以及高层对话；第四，将中国不断融入到国际社会及国际组织当中；第五，通过坚持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一个中国的政策、适当的对台军售，以及不把台湾视为地区安全盟友，避免台湾问题军事化，来控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第六，根据形势的发展，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美军前沿部署和同盟，作为一种预防和制衡手段。

奥巴马的所作所为也没有超出这一主流政策框架。我把他的政策概括为立足于三个基础：第一，承认并尊重中国的崛起及其合法利益，而且也把这看作是美国的利益；第二，坚持中国的崛起应该合乎国际规范和国际法；第三，加强同盟与伙伴关系，确保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是稳定的。

当前的中美关系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是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的。两国领导人经常交流；中美在朝鲜问题（如最近的安理会声明）以及伊朗问题（“五常加一”谈判已经恢复，中美保持合作）上的协调与合作都比较顺畅。台湾已经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而且这种态势在接下来几年将继续保持。由于台湾问题是一个中美两国从理论上而言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所以两岸关系呈现一种积极的状况及发展势头意义重大，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正与其他声索国进行积极的对话，这正是美国关注这一问题想要达到的目的。虽然中国担心美国对华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虽然一直令中国不满，但并没有对双边关系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或者说，比过去的情况有所改善。

我从事中美关系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亲历了包括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到1991年之间，1995年到1996年间，1999年到2000年间（贝尔格莱德“炸馆”事件和陈水扁当选“总统”），以及2001年年初（EP-3撞机事件）在内的最紧张的阶段。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不处于这样的紧张阶段中，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也和过去不同。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飞速崛起，中国在上世界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了；二是经济因素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变得更加重要了。然而，那种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流行的，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即将取代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论调，与事实完全不符。两国的国力和人均收入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

会消失。同时，近年来一些人认为，中国在不断地成长，而美国却处于衰落的趋势，不管最近几年是否如此，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却是必然的。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对习近平而言，才是当务之急。

关于中美关系，在媒体上，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学术圈中，都会出现一些自我繁殖的叙述。在奥巴马政府中，我就经历了好几种。第一年里，我们被告知，我们欠了中国1.3万亿美元；在中国人面前，我们是弱不禁风的乞讨者，因此十分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证据的缺乏并未怎么削弱这种说法。其观点主要源自对于一些小事的错误解读或者过度解读。第二年里，很多报道又指出，由于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国的强势，以及美国从第一年示弱中吸取教训并对此做出果断反应，中美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众的视线。

接下来，出乎意料的是，处于本应是高度紧张关系中的中美两国，却恢复了军事关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在朝鲜几次做出挑衅之后，中国外交官都协助让朝鲜保持克制；美国也接待了胡锦涛的访问，这次访问的特点是双方强调了彼此原有的对对方的现实理性的评估，并基于这一框架加强合作。因此，在2011年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种新的叙述出现了，准确地说，是一种非叙述，因为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新闻可以炒作，媒体对于中美关系就直接忽略了。最后，到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美国“重心”回归亚太的神话出现了。这种说法的确是一些政府官员提出的，但他们并没有加以界定。但这种提法使得中美两国的一些学者感到沮丧，结合东亚峰会、在巴厘岛关于南海问题的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以及美国在澳大利亚北部以轮换的方式部署海军陆战队等一系列事件，他们从中察觉到美国将要采取一种新的遏制政策。

那些在中国和美国认为天快要塌下来的人，应该去读一读克林顿国务卿最近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和海军学院所做的演讲。在这两次演讲中，她并没有赞同任何一种由那些将所谓的美国“重心”回归亚洲视为对抗性的、旨在遏制中国的人所起劲儿指认的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恰恰相反，她谈到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美国对于零和思维方式的拒绝，以及对于包括军事领域在内



的合作的重视。要知道，如果发表与之截然不同的演讲，尤其是在海军学院，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部分是出于对美国“重心”回归亚洲的反应，引发了关于中美之间所谓“安全困境”的讨论，字面上的含义是我们容易将对方采取的防御性措施视为针对自己的进攻性行为，并做出反应，导致一种相互升级的局面出现。与之相伴的是目前受到高度关注的“互疑”的提法。我个人认为“安全困境”所带来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去年美国和中国要开展高级文官和军官共同参与的战略安全对话，对于双方可能面临误判或者冲突的关键安全问题进行探讨。这也是为什么中美要展开军事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亚太政策对话，并且让两国元首频繁会晤。但不能因此做出“互疑”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判断。至少我不这样认为，我之前已经指出，在过去的某些时期，“互疑”的程度比现在要高得多。

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对美国政府的最高层而言，应对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挑战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脑细胞要比处理政治问题花费更多，像我这样参与处理中美关系长达三十年的人都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中国政府方面也可以此类推。经济关系中的摩擦和挑战，不管怎么说，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是非常可观的；至于“安全困境”和“互疑”这样的源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术语，对于处理经济问题而言，都不是正确的分析框架。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另外做更多的分析。

（李晨译，于铁军校）